

古文一筆一法



姜澄清 著
学古文笔法以救时文之弊
姜澄清文集·之七

贵州大学出版社
Guizhou University Press

ISBN 978-7-81126-037-8

再版总序

姜澄清文集·之七

古文一笔画一法



姜澄清 著 姜澄清文集·之七

学古文笔法以救时文之弊

贵州大学出版社

Guizhou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古文笔法 / 姜澄清著. -- 贵阳: 贵州大学出版社,
2013.12

(姜澄清文集)

ISBN 978-7-81126-607-8

I. ①古… II. ①姜… III. ①汉语—写作—方法
IV. ①H1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321397号

古文笔法

著 者: 姜澄清

责任编辑: 肖 敏

印 刷: 贵州创兴彩印厂

开 本: 72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: 11

字 数: 140 千字

版 次: 2013年12月 第1版

印 次: 2013年12月 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1126-607-8

定 价: 25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

电话: 0851-5981027

再版总序

文人到辑刊“文集”的时候，大抵至末路了。而自己呢，积一生之所成，向社会奉承者，亦仅此而已；在我，实在是愧赧交加的。我一生，除教书一事，勉强及格外，他皆不足道。然教绩不能显于纸素，于是，只得将这些所谓学术成果者，付梓刊行。自己从不敢怀金针度人的奢望——本人尚且待人相度，何言度人。过而言之，这个集子不过是姑奉浅陋与糊涂于诸君。此非以谦下邀誉，从1957年至1978年，二十年间，在饥饿与胡斗乱中，苟全混世，何言读书求学？自己不敢以“天也，非战之罪也”来自宽无成之憾。所聊可为慰者是，近三十年来，未敢虚掷光阴，因此有了点滴文绩。如果说，“英雄”是“时势”所“造”，那么“造”愚钝与浅薄者，孰耶？

当这个文集面世时，我已届八十，风灯雨烛，微光弱明，还能撑持几时？故在董理这些旧稿时，未尝不愀然暗伤。

我十八岁离滇客黔，一生都盘旋于山野中，其间，五十年都进退于三尺讲台。此中甘苦，非当事者莫能味。然积久成习，竟自乐于笔耘舌耕，夏则挥汗，冬则呵手，每文竟束管，仰见南窗，残月已垂，而东方已白矣。

纪文达（晓岚）晚年，以不堪考察之累，而以闲逸的“笔记”遣日自娱，到后来，连此亦厌。我正步着前贤的履辙，踏入百事皆懒执

的“无为界”。然前贤文绩煌煌，成证果而后寂，我却以果界中人的闲寂，掩己之情懒，不亦谬乎？在古贤是“非不为也，是不能也”，在我是非不能也，是不为也。

年届八旬的人，若要疏懒，可以编出很多理由，有了理由，便可心安理得地饱食终日，无所用心。我徘徊于堕、勤之间，择其可为者为之，于是，在古稀之后，便只写随笔之类。寿多必寂，朋友间过从日少，空巢孤叟，只好将素笺当朋友，摇笔面笺，有如对友倾谈。

因此，大抵界划，七十以前，多为学术之文，此后，便是随笔之类了。

我有二十年（1958—1978）的艺术教育经历，因出身“中文系”，所攻习者，不外“之乎也者”，而置身管弦歌舞的环境中，颇有樵叟下海、渔夫入山之困。然而，成就我日后研究的，正是这困境。二十年间，耳濡目染，皆笙歌图绘，于此专业之外的纷扰，始厌之，终爱之，我不期其然而然地陶醉其中，文化视野，因之洞开。此种自然的趋进，入乎性情至深，故，后期研究艺术，实乃自然的归宿。

在此二十年间，闻睹中外艺术，而耽之愈深，愈对往昔所受之“艺术概论”教育，渐生疑意。那些“概论”，本非为艺术立言，醉翁之意，不在酒也。“悟已往之不谏”，正是一种自我批判——上世纪80年代，在我，在社会，都是一个启蒙的批判时代。使我骤然名驰的文章，就是从艺术入手而批判庸俗社会学的。由今观之，这篇指认书法为抽象符号艺术的文章，指马为马，并无绪旨，而在指驴为马的时代，平常之说，便有不平常的价值了。在刊物加按发表，并号召讨论后，一场论辩便展开了。而我，因之成为核心人物，且被尊之为“理论家”、“美学家”。这场发生于1981年的讨论，惜乎未延及哲学、文艺学，否则，所“启蒙”者，便不会仅囿于书法界了。如此的偶然，又成了自己不能不如斯以进的必然，既戴上各种各样的帽子，欲拒不能，于是只得

顶冠而前。换言之，我是在戴上“理论家”的帽子后，才潜心致力于理论——既然难下虎背，何妨骑以驰之。新的治学道路，缘是而定。禅家曰“成佛当有立脚处”，治学亦然。我不经意撞到“立脚处”，从此，“由是而之”，从书法始，进乎绘画，因绘画之启迪，再研究华土色彩学理及中国艺术盛衰的生态原因。凡此，皆非预为设计，而系顺流趋进。有如一个泛舟随流者，我乐陶陶地漫游于中国文化的玄海中。

三十余年的研究，成绩非微，稍可慰者，草创了书、画学的体系，亦填补了前贤研究之未及者，即本土的色彩学理。对中国艺术的“生态”因缘，亦有新锐之见。

个人所可告诸君者，仅此而已。惜乎，今者强弩之末，气衰力微，既难耐寒灯冷凳之苦，更畏征引之累，老马迷途，不知所向，遂以随笔述录一时之感怀，虽曰“清谈”，实则姜（江）郎才尽，黔驴（黔固无驴，此随俗也）无技也。

《清谈录》及其续篇，是七十以后的混日之作。此时，虽于故有文献日渐疏忘，而在体验上，却优于少壮时。中国艺术，本属安静、淡远、柔婉、空寂之类，而人至桑榆之境，亦趋于此种氛致，空斋寂处，对春花秋月、丘山涧流，兀自多了相知之情。于是，便将此暮年的幽怀，随手述之，遂成就了“清谈”之“录”。也许，生活如斯，艺术也便不能不如斯了，而种种高论难免将当如是也的平常，论得离乎本相。讨论中国艺术，以得“土味”为获真。革命家“革”艺术的“命”，以使其服务于革命。于是，艺术便成了千依百顺的小女孩，任人牵引了。而洋博士呢，斥中国艺术“落后”、“不科学”，必欲使中国艺术“取西人之法”，削己足以就人履。新生代的洋博士，本疏于国学，然却大言中国书画，彼等以洋理论释土画学，术语虽同，然一经妄解，中国学问便西化了。鉴于此，我考释了画学术语，意欲正名；否则，华土理论，

形表虽“土”，却被“洋化”了。

如此这般，本土的艺术及其学理，经轮番强暴后，不复贞洁矣。我的努力，其保“贞”乎？

在咬文嚼字之暇，我也涂涂抹抹，此非欲跻身书、画界，去逐名争利，而是想假此以体验中国书画的玄机，以免门外文谈之弊。《文集》所附，即本人的涂鸦习作。丑妇见公婆，愧甚愧甚！

“新体文言”是二十多年前提出的，此亦感时而倡也。五六十年来的白话文学，颇有淡若白水之概。“白话”之兴，在实用交流方面，固为势之必然，而在文学方面，文言的美感是白话所不能取代的。毫无文言基础，而欲使白话有味，是欲赴浙而趋蜀也。古人不如今人的地方甚多，然独述文一事，今人难及。盖古人的荣辱沉浮，全系于文章。十年寒窗，诵读经史，科场成败，只定于作文。“五四”时代的硕儒通人，何以其白话文亦饶有韵致？因为他们有深厚的旧文学基础，故为文为白，皆能应付裕如。我提倡“新体文言”，是想开创一种大众皆能了然的文体，在保持文言简洁、有味的前提下，也使新体文言，明白如话。文集中辑录了我的几篇尝试之作。文学毕竟是语言之学，舍此，无论写什么，至多，也只是瓦舍唱本而已。

我的帽子不少——书论家、画论家、美学家，乃至作家、书画家。这实在是肢解了本人。还是老说法贴切，我勉强算得上个“文人”。以今义诠释，文人也者，文化人之谓也。此与古代“文德之人”、“文学之人”稍异。“文”，概指“文化”，在昔，大体指诗赋书画兼能者。此为综合之称，而这“家”、那“家”，则是分解之称。然，“文人”颇蒙揶揄，“文人相轻”、“一为文人则无足观”是古已有之的说法，我虽未染“相轻”的毛病，但确属“不足观”之类。“不足观”，谓无助于“治”、“平”，无补于生计，予每窃叹，文人之矢志“治国、平天下”者，鲜有善终——

“国”不能“治”，“天下”不能“平”，而只落得弃市长街的下场。因之，何须求“观”呢？中国文人之智者，于无奈中，遂潜身湖海山林，“隐”于“文”了。由是，有了五花八门的“隐”法——初则隐于山林，继则隐于市井、隐于翰墨、隐于睡、隐于醉，乃至隐于青楼。凡此，皆“以无益之事，悦有涯之生”（陶渊明语）的自安之术。彼等所奉的箴言，只是四个字——“莫谈国事”。那么，人有唇吻，莫谈国事，又不可能哑然，于是，便滔滔以言与国事无涉者——风花雪月、诗词歌赋、酒茶丹青，如此这般，便洋洋乎造就了中国最有情趣的“隐逸文化”。谁料到呢，最“不足观”的文人却创造了颇可观的文绩。欧阳文忠公（修）曰，“晋之文章，唯‘归去来’一篇耳”，然，仅此一篇，却垂之千古，而古今来汗牛充栋的媚时之作，却只留下恶臭。中国乏抗争的文化，却多“躲”的文化，隐士便是“躲士”，这一“躲”，便陶铸出了最悠绵淡恬的文类。故，欲探宝者，当在“地下”去找——隐士即“地下工作者”也。

我一生盘旋于滇黔，然身在山野，却心系庙堂，然“天意高难测”，年轻时，总忖测“天意”以趋赴，孰料，“天”象幻变，故跟之愈紧，愈陷迷途，是以，“隐”亦不能，跟亦不能——“两间余一卒”，“彷徨”殊甚。至退休之后，世道安定，所以，“退”以“休”之。此一“退”，近乎“躲”，于是乎，“躲进小楼成一统”，只管翰墨与丹青。遂有了“清谈”之类的文事。

以上所陈，为个人的“坦白交代”，诸君在览阅我那些劣文之前，先稍知其人，或能辨弦外之音也。

姜澄清

二〇一二年桂香时

于花溪补述

自序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，我在大学担任“写作”教学，过去，夏丏尊、朱自清、梁任公都教过这门课，不过那时称为“作文法”。以上前辈在担任这门课的教学时，已经著述宏富了，因此，可作经验之谈。在1977年，我任课时，个人于写作虽有体识，但要去教人，实在有以己昏昏，使人昭昭之嫌。然大学教学，实在也有方便处，按官定教材，照本宣科，虽“滥竽”，也能“充数”。然，在此过程中，自己亦不断充实教材之未及者，如是数年，便积累了不少资料，并予编纂，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，时在1986年。

那些年，“写作”很走红，除高考有“作文”一科外，其他各类成人教育、干部晋级都有，于是，五花八门的“写作”教科书应需而出，如《普通写作学》、《写作教程》、《高等写作学》，乃至《小说作法》、《诗歌作法》等等，层出不穷。其情形，即如本人——自己不娴于写作，却在台上大讲“写作”。盲人瞎马，实在是误人子弟。

三十年过去了，名目繁多、堆积如山的“写作教程”之类，如今，近等废纸，而大学里，“写作”这门课，也渐渐寂寞了。

要学会写文章，除多读多写外，别无捷径。幼稚的学生，以为“写作”教师能够金针度人，许多青年在听完“写作”后，说了自己的困惑：“不听‘写作’，还敢写；听了以后，反不知如何下笔。”高头讲章、科

举墨卷，只能将人变傻，至多，能写“八股”。

这本小册子是我自编的“非法教材”。当时，我窃以为，论作文之道，古人优于今人。在古，士子所学，唯文章一科，科场成败、人生荣辱，尽系于作文。五四以来，白话一统，然而前代大师，皆博通经史词赋者，故，即使以“白话”行文，亦清通可观。舍古文，而为“白话”，其“话”必“白”如淡水。试看，今之所谓白话文学，可读者，有几？

我劝青年朋友，多读历代名文，先从那些短的下手，背得百十篇，也便会无师自通了。把时间花在“教程”上，太可惜。

在重版之际，补述如上。重校旧文，乃叹光阴之匆匆。

姜澄清

二〇一二年八月

补述于花溪

目 录

绪 论 /1

第一讲 用 词 /7

一 用词的基本要求 /7

二 用词的基本方法 /13

三 词汇贫乏与堆砌词藻——用词的两大弊端 /19

第二讲 造 句 /21

一 造句的基本要求 /22

二 造句的基本方法 /22

三 句子通病举例 /35

第三讲 结 构 /37

一 结构的基本要求 /37

二 几种常见的结构形式 /39

三 开头、结尾与过渡 /49

开头法 /50

结尾法 /59

古文笔法

过渡法 /71

四 结构通病 /80

第四讲 表现方法 /82

一 叙述 /82

二 描写 /88

三 抒情 /97

四 议论 /103

五 表现方法的通病 /112

第五讲 立意与用意 /116

一 关于立意 /117

二 关于用意 /119

三 立意、用意流弊举例 /123

第六讲 古人修改文章的若干经验 /125

一 修改些什么 /126

二 几种修改的方法 /126

附：范文讲析 /130

山中与裴秀才迪书 /131

五柳先生传 /133

跋李庄简公家书 /135

寒花葬志 /137

祭柳子厚文 /139

祭石曼卿文 /141

记承天寺夜游 /143

酒 德 颂 /145

陋 室 铭 /147

爱 莲 说 /148

春夜宴桃李园序 /149

谏院题名记 /151

发使告诸侯击楚 /153

后 记 /155

再版后记 /157

绪 论

为文有三多：看多、做多，商量多。

——欧阳修

（引自陈师道《后山诗话》）

欧阳修是北宋时期的大文豪，其名声，显赫以极。那时，有一位作家说，文士们不怕坐牢，不爱晋升，也不贪生怕死，只怕欧阳修的意见。因为他的一句褒贬，便可以造就或毁灭一个人。当然，他从不任意轻率地成毁一个读书人；相反，倒是很有识人之明、爱才之心。比如，他对苏轼的奖掖，便是一段很有趣味的轶事、美谈。

北宋仁宗嘉祐二年（公元1057年）四月八日，苏轼和他的胞弟苏辙，双双参加殿试，主持这次考试的，便是欧阳修。那时，考试的制度很严格，应考人的姓名，不用说都是封了的，就是试卷，也全由其他人重抄过。苏轼的试卷，使欧阳修惊叹不已，欣赏了好几天，他说要让这个举子出人头地。又说，再过三十年，人们便只知道这个人而不知我欧阳修了。但是，欧阳修作了个错误的判断，他误以为这篇文章是自己的好朋友曾巩写的，为了避嫌，他便把卷子由第一名改为了第二名。直到四月十四日揭晓之后，他才知道写这篇文章的人是个年纪刚满二十岁的青年。欧阳修的预见与期望并没有落空，到了南宋时期，苏轼的文名果

然超过了他的恩师。

欧阳修不仅有识人之明，对于文章之道，也极谙熟。他一生著述很多，却不喜欢谈作文的方法、技巧，因为他不愿意夸耀一己的特长。（见《名臣言行录》）尽管如此，他所发表过的一些意见，却很中肯。

“怎样才能写好文章？”这个问题，一直是古今来十分困扰人的“老大难”。因为欧阳修是写文章的高手，所以，向他请教的人便不少。他的回答，总是说，要多读书、多写作、多跟人商量，此外，便再无什么诀窍了。

当然，这“三多”虽很得要领，却嫌空泛了些。读得少，写得少，写了以后也不跟人商量，自然便无从提高写作能力。但读得多，未见得便能写得好；写得多，也未必就能使运用语言的技巧熟练；而商量，包括修改，倘若没有起码的鉴赏能力，也“商量”不出什么名堂来。

所以，仅仅明白了“三多”的重要性，而不知道门径，不懂得方法，至少可以说，盲目的“多”，其收效是值得怀疑的。古代便不乏这方面的例子。晋朝的傅迪、唐朝的李善被人讥为“书箧”（以竹编成的圆形容器）。宋朝的张大中，明朝的程济，前者自号“黑漆书橱”，后者自号“两脚书橱”。方以智挖苦这种人“徒知诵死人之句”。

欧阳修“三多”的说法，实在是经验之谈，是提高写作能力的关键，只是太概念化，难免让人只知其理而不明其法。因之，我们便以这“三多”为绪言的内容，同时作一些解释，以使读者有法可依，知其门径，懂得怎么读，读什么，怎么写，怎么商量。鉴于写与商量的内容，在正文中将详为讲解，绪言里，为避免雷同，便只集中谈读书的问题。

不读书，一定不能写好文章，这是千古不变的规律。近代大学者王国维说，凡是古往今来的大学者，无不经过三个“境界”，第一个境界便是“昨夜西风凋碧树，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”，这与欧阳修“看多”

的意见很相近。所谓“望尽天涯路”，用今天的话来说，便是博览，涉猎面要广，要宽。

那么，“博”到什么程度、“广”到什么程度呢？这倒很难具体讲清。比如，一个高中学生，能在课本以外，去读读“杂书”，这至少可以说是不狭窄了——就他的情况而言。反之，假如一个连文章也都写不通顺的人，要“博”到去读佛经，读《易经》、《尚书》，恐怕也未必妥当。

那么，对于一个初学写作的人，应该怎么样去选择读物呢？

第一，要读读学业、专业以外的书。

学中文的人，总不能成天只去读唐诗、宋词，还应该读读史书、哲学书籍。学医的人，不妨读读小说、诗歌。

第二，最起码的名著应该去读。

太多，有困难。但那些最优秀的名著，不能不读。一个高中毕业生，没有读过《水浒》，一个大学毕业生，没有读过《红楼梦》，没有读过托尔斯泰的作品，应该说，这是文学修养上的缺陷。

面对一个阅读面十分狭窄的人，是无从谈写作问题的。“学充则文自至”，这是老话了。宋代的大诗人黄庭坚说：“多读则自能善作文。”（见黄庭坚《与王复观书》）道理何在呢？因为：

一、读书是增长知识、开拓智慧，丰富情感的重要手段。

英国哲学家培根说：“史鉴使人明智，诗歌使人巧慧，数学使人精细，博物使人深沉，伦理之学使人庄重，逻辑与修辞使人善辩。”各种各样的书籍，都能够从不同的侧面启迪我们的智慧，培养我们写作的技能。反过来说，不读书或读得很少，也便是愚昧、浅薄、贫乏的根源。

二、读书是学习写作技巧最有效的方法。

《李方叔文集》载：“东坡教人读《战国策》，学说利害；读贾谊、晁错、赵充国疏，学论事；读《庄子》，论理性；读韩、柳，知作文之体

面。”《吕氏童蒙训》谓：“读《庄子》，令人意思宽大敢作；读《左传》，使人入法度不敢容易。”这些话，意思不外就是，读各种名著去学习各种写作的技巧，技巧本不是背枯燥的条条所能掌握的，名著正是学写作的无言教师。它无处不在教你应当这样写，不应当那样写。

三、读书是积累词汇的重要途径。

这一点是不必多作解释的。把读书与写作的关系说得最明白的，要算刘定之。他在《刘氏杂志》中指出：

取之也勤，故其出之也敏。后之学者，束书不观，游谈无根，乃欲刻烛毕韵，举步成章，仿佛古人，岂不难哉？

“刻烛毕韵”这个典故出自《南史·王僧儒传》，是说南朝梁时几个文士夜聚，在烛身一寸处刻上记号，规定这一寸烛燃完便要成诗。“举步成章”则是讲曹子建于“七步”中吟成一诗的故事。两个故事都是说积学渊博，才能文思敏捷。“取之也勤，出之也敏”，就是这个意思。

可是，读书不讲究方法、不得门径，往往事倍功半。因此，还得明白方法才能收到实效。

宋代的理学大师朱熹对读书方法很有研究。这方法的总精神，便是“熟读精思”这四个字。具体的方法是“心到、眼到、口到”。近代学者胡适又增加了“手到”一条。且看他们是怎样解释这“四到”的：

眼到——

“要个个字认得，不可随便放过”。

（《胡适文存》三集第一卷）